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Sub.2/1999/8
22 June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全面审查与消除种族歧视有关的各专题的问题

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
仇外心理加剧情况下的全球化问题

约瑟夫·奥洛卡—奥尼扬戈先生按照小组委员会
第 1998/104 号决定提交的工作文件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7	2
一、今天的全球化：概括分析.....	8 - 13	3
二、全球化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 的关系.....	14 - 31	5
三、人权情况.....	32 - 36	10
四、结论和行动建议.....	37 - 40	11

导 言

1. 小组委员会在第 1998/104 号决定中决定委托约瑟夫·奥洛卡—奥尼扬戈先生在不涉及经费的情况下，就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日益严重情况下的全球化问题编写一个工作文件供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以作为对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问题世界会议筹备工作的贡献。本文件就是根据这一要求提交的。

2. 全球化问题是在本一千年即将结束时出现的，这无疑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全球化现象的影响完全可能变得更突出。对从象巴西总统恩里克—卡多索这样的政治家到象特德·特纳这样的新闻界显要人物，直到安第斯高原的农妇来说，“全球化”一词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含义上都不相同。因此，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可预见其发展前景的简单现象。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单一过程，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发展现象，这些现象往往相互矛盾、对抗，甚至相互冲突。¹ 遗憾的是，关于全球化的言论很多都是从种族中心、“世界秩序”的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到对理解这种现象至关重要的力量和控制的关系。²

3. 至少，全球化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迅速变成一个单一的经济融合体的过程，其部分动力是日益涉及世界的区域贸易集团的成立。³ 这个全球“自由”市场背后的驱动力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迅速转移的金融资本”，⁴ 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 1960 年代开始的计算机芯片革命以来技术，特别是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蓬勃发展。”⁵ 然而，上述定义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定义，它并未涉及全球化现象的各种，至少相互矛盾的表现方式。⁶ 任何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都必须抓住和均衡能力增长和自由这两个方面，以及对广义上的人权、种族平等、不歧视和争取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斗争的侵犯和破坏作用。⁷

4. 毫无疑问的是，即便人类在打破以前的种族歧视、区分和仇外心理的结构方面取得显著进展，⁸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⁹ 借用帕特里夏·威廉斯的话说：

“在一个一般来说表面上‘不分肤色的’世界中，肤色问题具体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从生活环境到死亡方式的每一件事的强有利决定因素？是什么意向掩盖了使得种族主导地位经常好象那么‘自然’，那么隐蔽，事实

上具有那么大诱惑力的社会等级？在废除奴隶制和种族平等法律确立之后的年代，种族主义如何在广阔的地理、时间和政治范围内继续演变和发展？”¹⁰

5. 遗憾的是，在当代人类从社会和政治到文化和经济的各方面相互关系中仍然普遍存在着种族主义。这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人们可能会问，在本一千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上升或整个现象的重新出现是否只是“偶然现象”。

6. 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给“种族歧视”下的定义相当全面，实际上包括以种族、肤色、出身、或民族或族裔为由的所有区分、排斥、限制或倾向的机制和过程。¹¹ 概括而言，种族主义是一种种族至上的思想以及使选定的种族群体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的机制。它包括暴力和种族灭绝、种族仇恨信息、诋毁和威胁、完全不同的待遇以及种族净化言论。¹²

7. 然而，一个经常存在的重要问题是种族主义相对于政府方面的民间方面的问题，虽然《公约》试图包括两个方面。¹³ 在关于种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关系的讨论中，这一问题的政府和民间方面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多数起重要作用者是民间的非国家实体，如跨国公司。¹⁴ 在这些实体和全球化辩论的其他重要参与者，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中，仍然普遍缺少全面的人权监督机制。¹⁵ 有效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是所有国家、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的一项义务。

一、今天的全球化：概括分析

8. 过多强调全球化的经济方面而不考虑其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具有削弱能力的作用。¹⁶ 这是因为它模糊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潜在和实际破坏作用以及它和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等现象的关系。¹⁷ 以“全球市场”为例：市场不一定是有关各方可公平分配利益和好处的平等地方，这是常识。同样，虽然全球化的主导思想是促进“自由”贸易，但很明显的是，其实际实行往往是另一回事。¹⁸

9. 而且，尽管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非洲几乎疯狂的实行经济自由化，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等多边机构也实行严格的结构调整方案，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似乎没有明显变化。¹⁹ 关于各亚洲“虎”，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往好说，充其量是好坏兼而有之，往坏说，则肯定是灾难性的。²⁰ 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的贸易制度自由化也给部分美洲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²¹ 换言之，失业、无家可归以及各种社会服务的削减等现象并不局限于任何地理区域。²²

10. 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单纯现象，也不是一种没有差别或简单的现象。基蒂·卡拉维塔简明阐述了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复杂问题：

“全球化一词被以无数方式用于很多不同目的，但含义相当模糊，它特别被用来指世界经济日益增强的一体化，这具有误导作用；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资本收缩的过程，只有三个主要区域(北美、欧洲和东亚)受益，而其他区域(特别是非洲)正在严重边缘化。”²³ 卡拉维塔倾向于用全球化来指第一世界经济的“加紧”一体化，虽然世界许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在严重边缘化。然而，这一分析必须再进一步。在解除管制的同时削减各种社会服务和生活福利的时候，穷人的境况更加严重。²⁴ 换言之，世界主要区域集团和国家之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不是这些过程的唯一结果。²⁵

11.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²⁶ 实际上，看一下现代人类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有三个不同的全球化时代或过程。²⁷ 第一个时代是完成帝国主义殖民化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人权原则国际化和全球民间社会成长的时代。与第二个时代并行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时代，第三个时代的特点是，“... ..作为超国家的权威中心出现的多国霸权和国际金融机构主宰的盛行。”²⁸ 三个时代互相联接、相互重叠。

12. 全球化辩论的“另一个方面”是与贸易、消费者保护、环境和人权等问题有关的相对自主的非国家因素的表面增长。²⁹ 这一“全球化的”民间社会是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最近的与环境各方面有关的公约等法律原则的发展同时出现的。³⁰ 全球民间社会成功地使当代和人类有关的很多问题全球化。的确，在最近关于《多边投资协定》的辩论中，全球民间社会对最终放弃条约草案的谈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³¹ 因此，一位评论家说，全球民间社会和《多边投资协定》背后活动者的对抗是“不同全球化的冲突”。³²

13. 然而，仍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民间社会本身是否没有它们指责他人所具有的那些结构性偏见和歧视因素。例如，“南方”的平民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参与了全球主要人权日程的制定以及对其结果产生了多大影响。³³ 对全球化过程的削弱作用以及真正全面考虑人权问题、不轻视一类权利而重视另一类权利的必要性给予了多少注意？³⁴ 全球民间社会是否真正摆脱了种族、性别、族裔和阶级的等级观念？简而言之，全球民间社会也必须回过来作一次深刻和严格的自我检查，看一看它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约束自己的人权理念，争取消除可能传染给整个国际社会的具有削弱作用的社会分化。³⁵

二、全球化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和仇外心理的关系

14. 1990年代，在和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有关的问题方面，只能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这是非洲官方种族隔离最终崩溃的年代；另一方面，则是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年代。它既是“多文化主义”和“世界音乐”的年代，又是“种族清洗”的年代。总的来说，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高涨令人震惊，特别是，种族主义暴力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消极的种族区分看来有所加强。在许多方面，这一领域的积极和消极发展都可以和全球化现象联系起来。³⁶

15. 种族主义组织存在的延续方式各种各样，包括从墙壁上的胡乱涂写到暴力谋杀等程度不同的扩散。³⁷ 在全球化时代，种族主义信息和符号的一种特别令人担忧的扩散和传播方式是互联网，近几年来，互联网几乎象爆炸一样迅速发展全球。世界网络的好处可以说很多，而且相当明显，它打破了很多通信障碍，创立了很多全球专题网络，传播了大量信息。然而，同样一个装置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广泛设置暴力、性别歧视、仇恨、淫秽以及种族主义网址。这些网址加强了对这种媒介的利用，这是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思想的特别有效而难以管理的一个论坛。一位观察家在谈到这种媒介的暴力网址时说：“网络中仍然有一些狂暴的内容”。³⁸ 种族主义网址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要监控这种内容极为困难。乔尔·沃尔曼发现：“他们自己国家内的一些小规模、孤立的运动得到国外类似思想集团的安慰，还

经常得到实际援助。”³⁹ 互联网为这种国际仇恨在全球范围的加强提供了很大便利。

16. 同样，千山自由广播电视网的电台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⁴⁰中甚至是一种更强大和恶毒的工具。在贫穷和边缘化严重加上文盲和独裁、不同和反对派政治受到严重限制的社会，情况尤其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社会和可能以国际武器转让为表现形式的(在苏丹、安哥拉或刚果)全球化力量和 SAPs(布隆迪)的联系有时不一定是积极的联系。⁴¹ 这种社会提供了促进武装冲突的必要工具，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种族灭绝，全球化力量则加重了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困，这些则加重了潜在的紧张关系。

17. 全球化过程自身中也可能包含着旨在统一、控制或压制全世界的种族优越和种族歧视的概念。⁴² 以知识产权为例，在世贸组织的主持下，它被置于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方面的范围。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方面基本上是为了使“团体化、经济现代化后的国家受益。”⁴³ 而且，

“为了实行这一模式，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得不摧毁，或至少是试图摧毁关于生命和生活以及所谓有秩序社会的本国概念。给商品设定物质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表达方式是和一個民族的历史和演变情况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国际化有可能破坏，如果不是完全摧毁，按当地制度为知识产权设定的价值以及它们为知识商品分配权利的方式。”⁴⁴

18. 在这方面，决定全球化过程的形式和内容的国际法律制度使在一般社会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受到更大的排斥。

19. 同样，向可口可乐和里保克(服装)这种全球性工业的增长似乎无关紧要。《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名流”和“全球中产阶级”遵循相同的消费方式，表现出对“全球名牌”的倾向。⁴⁵ 开发署指出了全球化过程对消费者权利的威胁，但也毫无疑问的是，以消费者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全球文化的均匀化影响对少数和土著群体的地位和福利产生了不利影响。⁴⁶ 如弗勒尔·约翰斯在谈到澳大利亚土著民族时所说：“土著民族没有决定自己文化的未来的实际权利，因而也就没有对抗文化均匀化和文化剥夺增加的国际手段”。⁴⁷ 在这一点上，约翰斯以回返飞镖作比喻，强调说，他“变成了一种土著居民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商品和形象。回返

飞镖作为一种纪念或标志更象一种土著民族仍然对其相对无能为力的文化和经济，而不是一种土著文化本身的标志”。⁴⁸

20. 种族主义和全球化在环境上汇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人们称为“全球环境种族主义”的现象,在美国等国的国内表现是一种政策,而在世界中也有其表现形式。⁴⁹ 在美国,当“... ..决策者不是根据平等分配垃圾场的好处和负担的原则,而是根据其他因素选择垃圾处理场时,就产生了“环境种族主义”的问题。一个垃圾场位置的选择往往只是根据受到周围居民有效反对的可能性是否最小。经验表明,这种周围居民往往多数是少数民族和穷人”。⁵⁰ 在国际上,环境种族主义现象是“危险废物出口问题的缩影”。⁵¹ 极少有疑问的是,这种出口大部分是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穷国。⁵²

21. 虽然某些学者也指出了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如对因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而失业的人的种族支援群体的加强,但全球化也肯定助长了非洲许多地区的种族主义、消极的种族区分和歧视。⁵³ 人们把以结构调整政策为形式的全球化与种族冲突的增加和仇外情绪的上升联系起来。⁵⁴ 结构调整政策是在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机构鼓动下多数非洲国家在经济方面最普遍实行的作法。朱利叶斯·依宏伯雷说,在国家惨败的情况下,这使多数穷人“别无选择,只能从种族或社区协会那里寻求安慰、支持和安全”。⁵⁵ 因此,在种族关系紧张形势加剧和处于全球化核心的许多政策之间存在着一一种关系。⁵⁶

22. 人所共知,全球化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控制某些类人员,特别是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徙工人的流动。这种现象没有任何方面比移民法和庇护法和政策方面更明显,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在那里,“欧洲要塞”⁵⁷ 和“堡垒”是当代对待移民现象,以致避难的主要政策框架。⁵⁸ 阿普里尔·戈登针对欧洲和美国许多人的“日益增加的恐惧”说,“... ..那么多移民,其中很多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夺取了当地居民的工作”。⁵⁹

23. 堡垒综合症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94年加利福尼亚选民通过的第187号建议,其目的是将移民排除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各种社会服务福利之外,还禁止公立学校接受未注册的外国儿童。⁶⁰ 该法还要求每个学校对地位可疑的任何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移民地位进行核查。幸亏,在联合拉美公民对威尔逊一案中,⁶¹ 法院只命令执行该法中与限制未注册外国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权利有关的部分。⁶²

24. 冷战后欧洲的特点是种族中心主义、恶性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出现。⁶³ 在许多国家,仇外心理的上升和公开的种族主义作法使难民、移徙工人和寻求避难者受到的法律保护严重减少。⁶⁴ 不用说,受不利影响最严重的是有色人种。⁶⁵ 在对欧洲的身份、公民资格和排外问题进行的一次深远分析中, 雅克琳·巴布哈指出, 在加强“欧洲化”的情况下, 遗憾的是, 非国民的边缘化日益严重:

“在欧盟成员国, 种族骚扰和暴力行为持续不断。在欧洲大城市, 警察的歧视行为和明显的强迫集中居住普遍存在。在就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仍然是整个欧共体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欧洲的第三国国民, 尽管根据法律可广泛享有各种国家福利, 但实际上却不能象当地居民那样充分享有各种公民权利”。⁶⁶

25. 在奥地利、比利时、美国和德国, 仅去年就有许多难民、移民和寻求避难者(特别是非洲人)被掐死、闷死和枪杀, 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是一位被驱逐出境的苏丹人在从法兰克福飞往开罗的路上被杀死。⁶⁷ 这些杀人事件不是警官所为, 就是移民官员所为, 最残酷的事件是几内亚移民阿马杜·迪亚罗的死亡, 他被纽约警察打了40多枪。⁶⁸

26. 令人特别关切的是, 在应当是向民众提供安慰和保护的一些主要机构中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作法和仇外心理的复燃。最明显的是移民机关和警察机关, 在过去几年中, 许多这种机关表现出与周围不断变化的人口情况越来越格格不入的态度。⁶⁹ 最近发表的关于斯蒂芬·劳伦斯在联合王国死亡的调查报告为重新出现的一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作用的定义, 1960年代中期, 第一次作为“机构种族主义”对这种现象作了无以辩驳的说明, 一些知名的督察认为, 伦敦城市警察局充满了这种机构种族主义。这里引用一句话来说, 我们所说的“机构种族主义的概念就是”:

“一个组织由于肤色、文化、或种族等原因未能向人们提供适当的专业服务。这可以表现在一些构成歧视的程序、态度和行为上, 如不明智的偏见、忽略、无动于衷和种族偏见, 这些使作为少数的种族处于不利地位。”⁷⁰

27. 尽管有人提出警察和少数以“伙伴精神”处理这些现象, 但城市警察督察的反应非常冷淡。⁷¹ 机构种族主义问题决不止限于伦敦警察。

28. 认为全球化会使世界更加统一的想法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实行开放的同时，也有一些关闭行动，这表现了事情的两面性。因此，在当代全球化力量越来越多的消除经济边界的同时，有形的地理边界实际上变得甚至更加严紧。遗憾的是，使边界更加严紧往往是出于从根本上来说是歧视性的考虑。⁷² 欧洲通过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同时实行的开放和关闭可能促进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传播。⁷³ 这样，作为全球化现象实质的经济一体化等进程加剧了许多非白种欧洲人的边缘化，因而使他们已经受到的歧视变得更加严重。

29. 在认为全球化可带来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家，区分变成了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总之，全球化实际上只是使具有特殊地位的极少数受益，而使往往被错误的称为“下层社会”的相当大的多数边缘化。⁷⁴ 这种边缘化太多地影响了有色人种、移民和妇女，它说明了为什么在使全球财富大量增加的过程中贫困化也同时不断加重。促使这种现象出现的各种力量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事件不断增加。

30. 虽然根本原因是仇外心理，但这种恐惧可能反映了部分是由全球化现象产生的某些现实情况。首先，它表明，世界的收缩使迁移变得更加容易。这造成更多“不同的”人到处寻找可能找到的各种机会。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特殊利益使人们更加害怕移民。在少数跨国公司从赚取超额利润想聚敛巨大财富逐步发展的时候，收益的积聚是在“衰退、调整和非工业化”的情况下进行的。⁷⁵ 结果是很多人失业和公民收入的停滞。潜伏仇外情绪很容易变成针对被认为是使问题变得更严重者的暴力和恶毒的种族主义。

31. 但即便是在难民危机的情况下，也同时存在着支持和保护两种制度。在科索沃危机之后，一些观察家评述了对白人和非白人难民的不同待遇。米勒和希蒙斯审查了在食品和配额、保健服务、住所提供以至水的配额方面对科索沃难民和许多非洲难民的截然不同的待遇。⁷⁶ 非洲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妇女的情况突出说明了男女之间的关系、种族歧视和现代国际法标准中的漏洞。⁷⁷ 全球化使非洲黑人妇女的地位降到最底层。

三、人权情况

32. 从上文可以看出，从自决权到结社、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很多人权受到严重影响。⁷⁸ 禁止种族歧视被承认为最重要的人权国际法标准之一，具有强制性法规地位，即不可减损的国际法绝对标准。“种族歧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只根据或主要根据种族特点对一些人给予比其他人较差的待遇。歧视可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应当给予不同待遇的情况下给予相同待遇，另一种是，在应当给予相同待遇的情况下给予不同待遇。⁷⁹ 全球化过程在几个不同方面不符合不歧视的基本标准。

33. 当然有一些和所讨论问题有关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书。其中首先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两项国际人权盟约以及最重要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例如，《公约》第4条要求将宣传种族仇恨思想定为一种罪行(宣传这种思想的最明显和不断扩大的讲坛是互联网，这可能也是全球化过程最有象征性的特点)。⁸⁰ 在关于种族主义问题的任何讨论中，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提到的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另外，还有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传播工具为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反对煽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在从《联合国宪章》到《世界人权宣言》等基本人权法律文书中都明确提出需要限制种族仇恨宣传。这些文书的核心特点是平等和没有种族主义的权利占首要地位。一些区域文书以及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也承认这一首要地位。在这方面，一些国家不赞成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这些国家宣布某些形式的种族主义言论为非法。

34. 还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其中规定对妇女的任何歧视待遇为非法，第11条对在就业方面的歧视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在实行私有化、缩小规模和全球化的其他主要办法的过程中，受到最不利影响的经常是少数、土著居民和贫困妇女。⁸¹ 《儿童权利公约》涉及童工问题，而关于移徙工人、少数和难民情况的其他各种文书也涉及很多方面的各种问题。最后，重要的还有劳工组织的各种公约和建议。

35. 全球化减少了国家的作用，因此，加强了一些特殊的非国家方面的力量，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同时，缺少加强这种非国家方面责任的有效机制，甚至允许他们逃避国内法律。⁸² 这些法律中有很多都包括为边缘化或传统上受歧视

的群体、妇女、少数和土著居民采取积极行动的原则。此外，由于它们是非国家的私方，实行行为准则、工会法、结社和言论权利等义务可能会很困难。⁸³

36. 穷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普遍争相进行的“下调”或“比赛下降”，减少社会保护，最终都不是加强对基本人权的保护。⁸⁴ 经常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这种调整的一个方面是经济保护区，在南方一些国家，在越来越多的建立这种保护区。其中许多国家没有非常完善的管理机制。然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26 条规定不论是国营还是私营方面以任何理由的歧视都是非法的。因此，不能允许以任何理由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待遇，除非有优先道理(如积极行动)。

四、结论和行动建议

37. 本文只是非常概括地叙述了一种表现形式相当复杂而难以理解的现象。作为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问题世界会议筹备工作的一个贡献，它充分说明了全球化问题及其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事件和仇外心理增加的影响并不是暂时的。这是一个需要联合国系统、多边机构和人权组织全面考虑、研究和采取行动的问题。

38.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需要在自己对全球化问题进行审查时考虑到本文所提出的全球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委员会特别应当鼓励《公约》缔约国重点说明全球化促使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事件和仇外心理增加的不同方式以及它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委员会还需要研究如何对被确定在全球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其活动可能直接或间接促使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事件和仇外心理增加的非国家方面更好地适用各项国际人权法律文书。

39. 有必要指出，根据各种国际法律文书，对移民的增加等全球化的各种表现作出反应的警察局和移民局等国家机构有明确的作用和义务。特别是，它们必须确保以不歧视、非种族主义和公平的方式行使职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需要鼓励在这方面遇到特别严重问题的国家审查招募方式和方法，实行对种族问题敏感的培训制度，鼓励警察队伍和移民官员队伍的更全面和更多样化发展。

40. 人权委员会在其第 1999/59 号决议中要求小组委员会进行关于全球化问题及其对充分享有各种人权的影响的研究，以供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根据这

项决议，小组委员会应当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更密切合作，更全面地研究全球化从各方面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影响。

注

¹ 见 Anthony Giddens：“难以控制的世界”，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Reith 讲座，互联网：<http://news.bbc.co.uk>(1999年4月11日)，第1页。编辑请注意“Gremlins”是 Spielberg 导演的一部科学故事影片中的人物。全球化是好事还是坏事，谁会知道？只有在有美国进行研究的学术界。

² 见 Dani Wadada Nabudere：“全球化，非洲殖民时代后状况，传统主义之后和新世界秩序”(作者保存的未发表论文，1998年)。

³ 借用 Upendra Baxi 的生动语言来说：

“多元化的空间不断缩小，以至整个世界变成无穷尽的一长串街道两边的拱廊商店或一长串百货商店，在那里我们都可望变成一种微生物——Gremlins，迫不急待的追求经过技术调节的快乐而不知道真正的快乐为何物。放眼全球可能使眼下的地盘丢掉。‘放眼全球，立足于脚下’在‘局部’变成‘全局’聚集点的当代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在实现全球化的同时实行的是世界帝国主义。”

Upendra Baxi：《人类的错误和人权》，1994年，第45页。

⁴ Devan Pillay：“非洲的全球化、边缘化和国家的撤退：民间社会在争取民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方面的作用”，《国际第三部门研究协会报告》，该协会出版物，1997年12月，第4页。

⁵ 同上。

⁶ 见 Giddens，前引书，注1，第2页。

⁷ 参见《全球化和歧视》，9(反对一切形式歧视和种族主义，ed.，1998年)，Rodolfo Stavenhagen：“全球化和排斥”。

⁸ 重要的是，不能把“种族”或“种族主义”和“族裔”的概念混淆或混同起来。如 Allen 和 Eade 所指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有一些使它们不同于其他族裔的特点。另外，这些特点“……还使它们在现代国家中特别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因为国家主权被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过程所侵蚀”。见 Tim Allen 和 John Eade：“从人类学角度看待族裔问题以及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冲突”，《少数和人权国际期刊》，第四卷，1996/97，第239页。

⁹ 见 Rita Jalali 和 Seymour Martin Lipset：“种族和族裔冲突：从全球看问题”，载于《新部落主义：种族和族裔的再起》，Michael W. Hughey(编辑)，1998年，第317至343页。

¹⁰ Patricia J. Williams,《争取不分肤色的未来: 种族的自相矛盾》, 1997年, 第13页。

¹¹ 有些评论者批评《公约》的定义不够广阔。Hernández-Truyol对定义提出批评, 因为她“……使美国的种族分析结构, 即黑白二元模式制度化”。她强调说, 这一模式“……不够全面、不连贯, 而且, 由于它把一些相互依存和不可分的完整而非分散的特点合并和混淆起来, 它还具有误导性”。见Berta Esperanza Hernández-Truyol: “种族、性别和人权: 一个重要的全球观点”, 《美洲国际法协会议事录》, 1997年, 第91卷, 第413页。Lisa Crooms还强调说, 《公约》中对种族的概念化认定男性“……代表一个性别中立点和(美国)反歧视法正式平等原则的核心”。另外, “种族是用男性中心主义语言概念化的, 作为种族要求, 这种概念不能解决对男人所没有的对妇女的人权侵犯问题”。见Lisa Crooms: “妇女的人权和《消除种族歧视公约》有何关系?” 1997年《哈佛法律期刊》, 第40卷, 第620页。

¹² Mari J. Matsuda: “政府对种族主义言论的反应: 考虑受害者的遭遇”, 载于《伤害性语言: 重要的种族理论, 攻击性言论和第一次纠正》, Mari J. Matsuda等(编辑), 1993年。这种思想由于“粗俗种族主义、空谈种族主义、公司种族主义和政府种族主义……”得到加强, 而“暴力行为则是种族主义结构的一个必要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同上, 第24页。

¹³ 《公约》第2条(d)款规定, 缔约国有义务“……制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实行的种族歧视”, 这为对私方种族主义采取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 执行这一规定不是没有困难的。

¹⁴ Michael Posner在关于业务和人权的地位的一次讨论中说, “……作为这次讨论核心问题的还有一些大国际公司, 其中很多是美国和西方的公司。问题是, 在这种背景下, 这样的经济实体有什么正面的义务或责任? 我们应当讨论如何加强权利或标准——在不歧视、奴役或童工等问题上, 有关权利或标准是相当明确的。人们越来越一致的认为, 这些的确是权利和标准, 但在当地政府脆弱或不愿实行的情况下, 公司的正面义务是什么?” 哈佛人权方案, 《业务和人权》, 1997年, 第18页。

¹⁵ Dirk Messner: “争取签订一项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 全球化和政治面临的挑战”, 载于《发展与合作》, 1999年, 第4页。

¹⁶ 见David Slater: “对西方全球观点的质疑: 地理政治理论和南北关系”, 载于 Mas Alla'Del Derecho - Beyond Law。

¹⁷ Tade Aina: 《非洲的全球化和社会政策: 问题和研究方向》, 1997年, 第8至10页, 第18至20页。

¹⁸ 见Marc W. Brown: “自由贸易、私有化和民主对东欧少数人权情况的影响: 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境内吉普赛人案例研究”, 载于《Buffalo人权法审查》, 第4卷, 1998年。

¹⁹ 见 A. Hoogvelt: 《全球化和殖民化后期世界》, 1997 年。

²⁰ Khawar Mumtaz: “在实现生活权利的同时实现生育卫生”, 载于《发展》, 第 42 卷, 1999 年, 第 15 至 17 页(认为经济全球化现象对整个南亚产生了不利影响, “……对妇女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

²¹ John Dent: “经济自由化、北美自由贸易协会和人权: 加拿大、墨西哥和智利的情况”, 载于 Mas Alla'Del Derecho - Beyond Law, 第 11 号, 1994 年。Cuninghame 和 Corona 将“脱离北美自由贸易协会实行自治”的必要性和墨西哥 1994 年 1 月的 Chiapas 暴动联系起来。见 Patrick Cuninghame 和 Carolina Ballestros Corona: “半夜彩虹: Zapatistas 和自治”, 载于《资本和阶级》, 第 66 卷, 1998 年, 第 19 页。

²² Pierre Sané: “基本自由”, 载于《人权: 新的协商一致意见》, Richard Reoch(编辑), 1994 年, 第 41 页。

²³ Kitty Calavita: “移民法和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 西班牙摘录”, 载于《法律和社会评论》, 第 32 卷, 1998 年, 第 537 页。

²⁴ 见 Vivien Schmidt: “新的世界秩序, 一体化: 企业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衰退”, 载于《Dae daws》, 第 124 卷, 1995 年。

²⁵ 开发署最近的报告回顾说, “1960 年, 居住在最富有国家的 20% 世界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 20% 人口收入的 30 倍——到 1995 年, 则变成 82 倍”。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 1998 年, 第 29 页。

²⁶ 如 S. Hall 所指出: “全球化过程……是在一个长得多的历史阶段发生的; 我们的历史健忘症越来越严重, 我们以为, 一种想法刚刚开始, 正是因为我们在考虑它”。见 S. Hall: “局部和全球: 全球化和族裔”, 载于《文化、全球化和世界制度》, A. D. King(编辑), 1991 年, 第 20 页。

²⁷ 关于一个重要分析, 见 B. S. Chimni: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法: 当代分析”, 载于《经济和政治周刊》, 1999 年 2 月 6 日, 第 338 至 339 页。

²⁸ Baxi, 前引书, 注 3, 第 39 页。

²⁹ Mustapha Kamal Pasha 和 David L. Blaney: “幻想的天堂: 全球文明社会的理想和幻灭”, 载于《替代办法》, 第 23 卷, 1998 年, 第 422 页。

³⁰ 见 Richard H. Stanley(序言): “联合国和文明社会: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1999 年, 第 8 页。

³¹ 见 J. Oloka-Onyango 和 Deepika Udagama: “作为国际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政策和实践的主要目标的人权”,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文件(E/CN.4/Sub.2/1999/11)。

³² Stephen Kobrin: “MAI 和全球化的冲突”, 载于《外交政策》, Fall, 1998 年, 第 97 至 109 页。

³³ 关于对这一问题的具有启发作用的研究，见 Makau Mutua：“人权思想”，载于《佛吉尼亚国际法期刊》，第 36 卷，1996 年，第 607-626 页。

³⁴ 例如，Khawar Mumtaz 在 1995 年在开罗举行的世界人口和发展会议上表示认为，南方的妇女……“发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她们的简单生存问题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维持生活的问题没有得到对应的充分关心。她们发现，全球化问题没有得到南方妇女愿意给北方妇女的相应支持和关心”。Mumtaz，前引书，注 20，第 17 页。

³⁵ Pasha 和 Blaney，前引书，注 29。

³⁶ 当然，这种事件的发生有从社会到心理的多种原因。关于对后者的分析的例子，见 J. Anderson Thomson 等：“西欧新种族主义的心理原因”，载于《群体权利国际期刊》，第 3 卷，1999 年。

³⁷ 后者的最近一个例子是 James Byrd Jr.。他被残忍的割下头颅，在此之前，他被拴在汽车的保险杠上拖了两英里。见 1999 年 2 月 23 日《纽约时报》，第 A 16 页，第 2 栏：“被称为审判的残忍杀害接近尾声”。

³⁸ 见 1999 年 5 月 26 日《新视野》，第 20 页，路透社：“受害者呼吁结束网上暴力宣传”。

³⁹ Joel Wallman：“种族和民族的密切关系：HFG 会议”，载于《HFG 评论》，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1996 年秋季，第 1 号，第 1 卷。

⁴⁰ 见 Jaime Frederic Metzl：“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国际无线电干扰法”，载于《美洲国际法期刊》，第 91 卷，1997 年，第 629 页。

⁴¹ 见 Léonce Ndikumana：“布隆迪的机构瘫痪和族裔冲突”，载于《非洲研究评论》，1998 年，第 43 页（其中提到，在布隆迪，即使是在有证据表明国家机构被用作压迫和镇压民众的工具的情况下，捐助资金仍然不断流入该国）。

⁴² 见 Victor Kaisiepo：“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土著民族的权利”，载于《土著民族事务》，第 3 卷，1998 年。

⁴³ Ruth L. Gana：“第三世界的创造性消失了吗？知识产权国际化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载于《丹佛国际法和政策期刊》，第 24 卷，1995 年，第 143 页，见 E/CN.4/Sub.2/1999/11。

⁴⁴ 同上。

⁴⁵ 开发署，前引书，注 25，第 6 页。

⁴⁶ Giddens，前引书，注 1，第 5 页。

⁴⁷ 见 Fleur Johns：“作为白人的艺术家形象：国际人权法和土著文化”，载于《澳大利亚国际法年鉴》；另见 Claudio Lomnitz：“全球化时代的衰落”，载于《文化人类学》，第 9 卷，特别是第 262 页（其中提到所谓第一世界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成功地使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进一步处于从属地位）。

⁴⁸ 同上。

⁴⁹ Dent, 前引书, 注 1, 第 90-92 页。

⁵⁰ Hugh J. Marbury: “危险废物的出口: 环境种族主义的全球表现”, 载于《VanderbilH 跨国法律期刊》, 第 28 卷, 1995 年, 第 279 页。

⁵¹ 同上, 第 291 页。

⁵² 如 Giddens 教授所发现, “一些跨国公司出售在工业国家被管制或禁止的商品——劣质药品、破坏性杀虫剂或高焦油和尼古丁含量香烟。一位作者最近说, 这不是全球村, 而更象全球掠夺”。见 Giddens, 前引书, 注 1, 第 5 页。另见 Kaisiepo, 前引书, 注 42, 第 13 页。

⁵³ 见 Eghosa Osaghae: “尼日利亚的结构调整和族裔问题”, 载于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研究报告》, 第 98 号。

⁵⁴ 同上, 第 44 至 54 页。

⁵⁵ Julius Ihonvbere: “非洲的‘不相干的’国家、族裔和国家地位要求”, 载于《族裔和种族研究》, 第 17 卷, 1994 年, 第 51 页。

⁵⁶ 见 J. Bayo Adeganye: “非洲的结构调整、民主化和族裔紧张关系的加剧”, 载于《发展与变化》, 第 26 卷, 1995 年。

⁵⁷ 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 欧洲国家和美国都采取了更严格的移民和庇护政策。见 David O’Keefe: “欧洲移民政策的出现”, 载于《欧洲法律评论》, 第 20 卷, 1995 年。

⁵⁸ 见 Bill Frelick: “难民权利: 人权保护的新界线”, 载于《Buffalo 人权评论》, 第 4 卷, 1998 年, 第 268 至 271 页(叙述了欧洲国家的仇外反应, 这导致在波斯尼亚建立了“安全庇护所”)。

⁵⁹ April Gordon: “新的大流散: 非洲向美国的移民”, 载于《第三世界研究期刊》, 第 15 卷, 1998 年, 第 97 页。

⁶⁰ 见 Sandra L. Jamison: “提案 187: 美国可能在削减其国际条约义务”, 载于《丹佛国际法和政策期刊》, 第 24 卷, 1995 年。

⁶¹ C. D. Cal. 1995 年。这显然是法律概念标准, 但编辑未能发现这是哪方面的标准。

⁶² 然而, 从反面来说, 法院没有否定法律中关于禁止无证件外国人享受公共、高等教育以及某些生活和医疗福利的规定。

⁶³ Theo van Boven: “国际人权保护的平衡和挑战: 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 载于 IMADR, 前引书, 注 7, 第 101 页。

⁶⁴ 同上, 第 358 至 359 页。另见《现代欧洲对难民的排斥和接收》, Philip Muus(编辑), 1997 年。

⁶⁵ 见 Jalali 和 Lipset, 前引书, 注 9, 第 323 页(指出, 在德国, “每天”发生特别是对外国工人及其家属的种族性攻击, 据报导, 仅在 1989 年就发生了 600 起这种攻击)。

⁶⁶ Jacqueline Bhabha: “滚回你的老家去: 欧洲的身份、公民资格和排外”, 载于《人权季刊》, 第 20 卷, 1998 年, 第 602 页。

⁶⁷ 路透社: “被驱逐的苏丹人死在飞机上”, 载于《星期日观察报》, 1999 年 5 月 30 日, 第 7 页。据报道, 警察强行把他捆在座位上, 并给他带上一顶摩托车头盔。

⁶⁸ Ronald Kayanja: “和种族主义作斗争? 你需要钱”, 载于《星期日观察报》, 1999 年 5 月 14 日, 第 29 页。

⁶⁹ 见 Richard Latter: “控制欧洲正在兴起的暴力浪潮”, 载于《国际群体权利期刊》, 第 2 卷, 1994 年, 第 191 至 192 页。

⁷⁰ 《Stephen Lawrence 调查: Cluny William Macpherson 爵士调查报告》, CM 4262-1(1999 年 2 月), 见 1999 年 4 月 18 日, 网址: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co.uk/document/cm42/4262.html>。报告接着说: “它 [机构种族主义] 继续存在是因为有关组织没有通过政策、范例和领导公开和充分承认并解决其存在和根源问题。不承认, 而且不采取行动消除这种种族主义, 它就可能成为有关组织的道德或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疾病”。

⁷¹ Alan Travis: “在种族法律上遇到重大障碍”, 载于 1999 年 3 月 11 日《卫报》, 第 1 页。

⁷² Cris Shore: “欧洲的族裔、仇外心理和边界”, 载于《国际少数和群体权利期刊》, 第 4 卷, (1996/97)。

⁷³ 同上, 第 259 页。

⁷⁴ 见 Williams, 前引书, 注 10, 第 32 至 33 页(说明作为黑人的委婉代名词的“下层阶级”)。

⁷⁵ 同上, 第 97 页。

⁷⁶ Christian Miller 和 Ann Simmons: “科索沃难民有鸡吃, 而非洲难民没有水喝”, 载于 1999 年 5 月 26 日《观察报》, 第 14 页(原以“非洲和科索沃难民营, 分开的世界”为题, 载于 1999 年 5 月 24 日《洛杉矶时报》)。

⁷⁷ 见 J. Oloka-Onyango: “大部分人的境遇: 人权、性暴力以及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难民的法律地位”, 载于《丹佛国际法和政策期刊》, 第 24 卷, 1996 年。

⁷⁸ 见 Florence Butegwa 和 Taaka Awori: “全球化及其对非洲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影响”(与作者共同存档文件, 1998 年)。

⁷⁹ 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促进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立场文件》, 1995 年。

⁸⁰ 另见国际人权理事会: 《认真承担义务: 国际人权法中的个人义务》, 1999 年。

⁸¹ 见 Angela Keller-Herzog: “全球化和男女平等问题: 发展前景和干预”, 1996 年 12 月。

⁸² 见 Schmidt, 前引书, 注 4。

⁸³ 关于在母乳替代品辩论过程中加强实行这些标准的困难的讨论, 见 Leslie Wirpsa: “母乳喂养是否一种天然权利? 自由贸易对不道德销售母乳替代品的影响”, 载于《Mas AUa'Del Derecho - 法律之外》, 第 9 号, 1994 年。

⁸⁴ 见 Jeremy Brecher 和 Tim Costello: 《全球村还是全球掠夺: 从下至上的经济建设》, 1995 年。

-- -- -- -- --